

本书出版获伊斯顿教育基金资助

G210

D179.2

20世纪 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

● 主编 戴元光 童兵 金冠军

应用新闻学卷

● 单波 著



A0996309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 应用新闻学卷/单波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10
ISBN 7-309-02855-4

I. 2… II. 单… III. 新闻学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G2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4873 号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复旦大学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9.75 插页 2

字数 322 千

版次 2001 年 10 月第一版 200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以上文明史的国家,两千多年前就有关于传播的概念,关于传播活动的评价,关于传播技巧与传播思想的论述。但是,正如国际著名传播学家余也鲁教授所评价的,一个有如此丰富的文化背景的民族,一直没有人在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方面下功夫,实在令人诧异。

20 世纪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最为迅速、影响力最大的 100 年。当我们立足新世纪去审视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所走过的风风雨雨的历程时,不仅为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虽历经艰难却不断前进而感慨万千,也为我国新闻与传播学学子虽遭困厄,却“操持不苟”,“日穷万卷”而自豪与骄傲。

20 世纪前 50 年,中国的传播业是在西方传播业的影响下,在殖民文化、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重压下缓慢发展的。1949 年后,中国新闻与传播事业曾稳步发展,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有过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但受极左思想的影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与国际新闻传播业距离越来越大,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文革”时代,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惨遭劫难,新闻与传播事业处于停顿甚至倒退的状态。值得庆幸的是,1978 年以来,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新闻与传播事业飞速发展,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拨乱反正,逐步走向法制的轨道。

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专门研究是从新闻传播史开始的,有近 200 年的历史。早在 19 世纪中叶,就已经出现了记述和探索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史的论文。20 世纪初叶,已有关于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著作,1917 年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至今已有 80 多年的历史。1927 年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是 1949 年前影响最大的新闻传播史论著。1949 年以后,中国新闻史研究进入新时代,尤其是改革开放的 1978 年后,新闻传播史研究成为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最活跃、研究队伍最大、成果最丰

富、发展最快的研究领域。据不完全统计,仅最近的20多年,中国大陆就出版了100余部新闻传播史研究专著与教材,发表了5000多篇论文。

我国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起于近代报业出现以后。1873年,《申报》发表了《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是迄今所能见到的较早的理论研究文章。1918年蔡元培先生创立了我国第一个新闻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1919年,徐宝璜撰写了我国第一部新闻传播理论著作《新闻学》。20年代后,列宁的报刊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40年代,中国共产党开始系统研究列宁的报刊思想和新闻传播理论。总体看,1949年以前,我国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无大的建树。1949年后到“文革”前,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虽有进展,但成果不多。我国大陆的现代新闻传播理论研究首先是在清理“文革”的破坏和干扰,从新闻传播理论的ABC开始的,这不能不使中国的新闻学子的心灵受到震动: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新闻传播理论如此之滞后。改革开放后,新闻传播理论研究逐步开展,并有实绩。80年代初就有几部理论著作先后出版,但大体上仍未摆脱“左”的影响。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虽受到多方面的干扰,但研究成果已颇丰,水准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真正取得突破性进步的,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我国大陆先后出版各类新闻学著作、教材和普及读物达2000余种。

人的传播活动是从第一声啼哭开始的,我国的先贤圣哲们对传播的认知非常悠久且非常深刻,职业传播者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早在春秋战国和先秦时代,就有“揽宾客”,“养”学生,“著书本天下”之风气,但传播学在中国的出现却比西方晚半个世纪。20多年前,西方人把传播学概念传进中国大陆时,我们对“传播学”这个词还非常陌生。20多年来,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经历了痛苦而漫长的过程。传播学学科地位在中国的确立,是许多学者不惧“困厄”,孜孜追求的结果。从禁区到发展为二级学科,仅跨越了20多年。20多年时间,等于中国电视从发展到初步普及加上网络传播初步发展的时间,等于一个孩童从第一声啼哭到大学毕业。但我们还是有理由欣慰:我们的书架上有100多部中国人的专(译)著,1000余篇传播学论(译)文。从1997年起,我国已有传播学的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新闻业务的研究起步较早,但研究范围较小。过去关心的主要是采写编评等实务,忽视对新闻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研究;对新闻是不是商品,新闻的功能究竟是什么,新闻媒介集团化产业化问题,也缺乏深层次研究。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陆共发表新闻业务方面的论文、论著、教材、译著、作品集等1800多部(篇)。

最近几年,我国关于媒介经营管理和新闻法学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发展,新闻与传播学学科、相关学科包括传播心理学、传播伦理学、舆论学、宣传学、公关与广告学的研究,这几年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绩,并有向交叉、边缘、应用方向发展的趋势。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新闻法学研究备受关注。大陆新闻法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新闻学界首先提出研究新闻法的问题,1984年,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成立新闻法研究室,1988年,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成立。进入90年代,研究新闻法的论文逐渐多起来,内容涉及新闻自由、知晓权、名誉权、舆论监督等,并于1991年和1993年召开了新闻纠纷与法律责任研讨会,90年代中期起,一些理论著作陆续出版。

20世纪是世界新闻传播事业空前发展的一个世纪,传播媒介从单一的印刷媒介(报刊图书)发展到广播、电视、电影和网络媒介。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虽落后于西方,但也有很大的进步,包括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即:1949年前印刷媒介和广播的发展,1949年以来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发展,1978年以来传统传媒、电子传媒和网络传媒的发展。经过这三个阶段,我国大陆的新闻传播事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小。现在我国大陆有1900多家有(无)线公共电视台,900多家广播电台,2000多家报纸,8000多家刊物,每年生产200多部电影,1000余部电视剧。网络传播虽起步于1995年以后,但网民却已达到2000万,而我国传播学者对网络传播的关注还较早。

综观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走过的百年历程,我们不能不认识到,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现状与国际研究水准相比,与我国近13亿人口相比,与我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新闻与传播市场相比,与我国初具规模的新闻与传播事业相比,与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相比,是不相称的,是应该有危机感的。

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最薄弱的是基础理论研究。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首先是缺乏对西方国家传播理论的系统梳理和研究。提到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大概没有人否定,谈到西方的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有

些人是否定的。不能说西方的科学技术非常先进,而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一无是处。研究西方文化也不是为了马上去实行它,而是去认识它,消化它,也包括吸收它,批判它,甚至改变它。文化的同化、被同化,文化的异化和移情是客观的和正常的,害怕西方文化是下策,增强自身的免疫能力才是要紧的,何况许多文化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无国籍的。其次是学术研究环境不够宽容,干扰多。学者应当立足现有的基础,从现状去看未来,研究未来,预测未来。研究未来,预测未来,就要看到现在的不足,就要有批评精神。没有批评精神的学者不能算是真正的学者,批评(包括反批评)越多离真理越近。我国大陆现在实行的许多改革开放政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是无法想象的,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是难以想象的,但邓小平同志以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胆略去实践,走出了一条新路。新闻传播也一样,80年代末,还有人批评把“广播、电视、报纸”称作“传播媒介”,现在大概不会,但有些人对媒介产业、媒介市场、媒介消费、媒介兼并很敏感,提到“新闻自由”、“新闻商品属性”、“产业化”就恐惧,就过敏,好像这些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加入WTO在即,这些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关键是我们要去研究,做前人没有做、不敢做的事情,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加强理论研究和新闻学、传播学科建设是新千年的首要任务,因为新闻学和传播学都已经成为一级学科,而对于它们的发展却不能没有系统研究;传播学的中国化研究刚刚开始;网络传播的许多问题还很模糊;加入WTO将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研究课题。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是十几位作者三年多时间的研究成果,是两岸三地专家学者的共同心血,是集体的智慧和劳动成果。它展示了100年来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勾画了它们发展的基本轮廓。

早在1995年就设想写50年(1949—2000)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1996年,童兵教授应邀去兰州大学讲学,在同戴元光叙旧时,共同探讨了组织专家研究100年(1901—2000)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问题。在认真磋商后,初步设想从七个方面研究100年来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即理论新闻学、新闻史学史、应用新闻学、传播学、宣传学与舆论学、公关与广告、台港澳新闻与传播学,商定了拟邀请的专家,开始筹集启动经费,并于1996年底开始启动。1998年夏,童兵教授、明安香教授、邵培仁教授、徐培汀教授、夏鼎铭教授、金冠军教授、戴元光教授等聚会上

海大学乐乎楼,就研究 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进行了讨论,并达成共识。

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方明伦教授一直关心本研究的进展,并同专家交流学术问题。著名新闻传播学专家宁树藩先生、丁淦林先生、夏鼎铭先生、彭家发先生审读了编写大纲,并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吴小美先生、樊凡先生、魏永征先生、刘树田先生、朱敏彦先生、孙旭培先生、曹家麟先生、张国良先生、霍红辉先生、徐维杰先生、陈力丹先生、李良荣先生、丁柏铨先生,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许多具体的帮助。复旦大学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许多专家学者为本书的编写出谋划策,并一直关心本书的编写进度。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20 世纪已经过去,21 世纪的曙光已沐浴大地。新闻与传播学学子已登上新世纪的航船!

编委会

2001 年 1 月 1 日

《20 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

编委会

学术顾问：方汉奇 甘惜分 丁淦林 赵玉明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少南 李海林 李 雷 邵培仁

金冠军 郑贞铭 单 波 明安香

周稔青 徐培汀 童 兵 戴元光

编委会主任：李海林 周稔青

主 编：戴元光 童 兵 金冠军

主 笔：（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少南 邵培仁 单 波 明安香

郑贞铭 徐培汀 童 兵 戴元光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20 世纪中国新闻业与新闻观念演进的历史与逻辑	1
第二章 新闻观念启蒙时代的办报思想	12
一、西方新闻观念的输入与近代新闻观念启蒙 序幕的拉开	13
二、本世纪初报业发展的初步总结与办报原则的呈现	17
三、“革新报界”活动与新闻业务观念的演进	21
四、白话报的发展与“为国民立言”的新闻语言观念	29
五、党报观念的初步形成	33
第三章 走向新闻本位时代:新闻观念的现代化与系统化	39
一、黄远生:“叙事一事,贵能恰如其分,调查研究,须有 种种素养”	40
二、邵飘萍:“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办报的第一信条	44
三、徐宝璜:“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	50
四、任白涛:新闻事业“绝对当以公众为本位”	55
五、戈公振:“新闻之变化,不外求适合于社会而已”	60
六、黄天鹏和他的“以新闻为本位”的研究群体	67
第四章 大众化与新闻宣传并存的时代:新闻观念向纵深发展	77
一、中国新闻学研究会:“现代的新闻纸,是社会群众 恃以生存的精神食秣”	78
二、成舍我:使读报像看戏一样有趣	82
三、张友渔:社论必须关系时事,有所解释批评及主张	91

四、郭步陶:代表民众说话,在“人”的层面进行新闻价值判断	95
五、邹韬奋: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	101
六、《解放日报》:报纸是人民大众的喉舌	111
七、邓拓:“最真实的群众内容才是最生动的”	117
八、国民党的新闻思维:为党的需要立言	123
九、管翼贤: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相分离的新闻观	134
十、萨空了:使副刊成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实验室	144
十一、程仲文:读者的心灵所引起的反应,即是对一篇新闻评论最忠实的估评	154
第五章 非市场化时代:新闻观念的曲折演进	160
一、《人民日报》改版: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改进文风	162
二、邓拓:应该讨论广大人民群众所普遍关心或具有普遍兴趣的问题	172
三、赵超构:“短广软”晚报三字经	176
四、穆青:报道“问题”可以克服那种只报道成绩、不报道困难的片面性	182
五、“文革”新闻思维与恽逸群的反思	191
第六章 市场化与信息化时代:新闻观念的全面演进	204
一、安岗:报纸是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206
二、穆青: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性通讯社	212
三、范敬宜:新闻报道要做到“三贴近”,拥有“三个意识”	220
四、艾丰:用多侧面的报道反映多侧面的现实	229
五、范荣康:新闻评论来自社会舆论,作用于社会舆论	239
六、樊云芳:实现“全方位、大综合、超时空、深层次”的新闻报道	247
七、杨伟光:电视传播必须将人民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254
八、电视栏目观念:向电视的本质回归	261
九、《冰点》:关注普通人的不普通的命运	268

十、网络新闻传播观念:实现传统媒体与网络的融合·····	271
20 世纪中国新闻业务研究重要文献编年·····	278
主要参考书目·····	295
后记·····	297

第一章

引论:20 世纪中国新闻业与新闻观念演进的历史与逻辑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理性的人总是充满忧患的,同时,忧患又是人的道德情怀的自然流露。当时间老人以惯常的节奏揭开 2000 年新的一页的时候,人作为反思的动物,很自然地以千年、百年为跨度来衡量这个世界上曾经存在的一切,而其理性和道德情怀又指向错综复杂的现实与扑朔迷离的未来。对中国人来说,千年、世纪概念的获得,更是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融入世界潮流的产物。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被卷入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潮流之中,中国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信仰等方面与世界发生了广泛的联系,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朝心态”正是在这种广泛的联系之中被逐步溶解,同时,中国社会原来的发展进程也被截断了,被迫成为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从东亚的中心变成世界体系的边缘,发展趋势由本位自然走向变为对外参照走向,文化心理态势在一度封闭排外之后由内聚转为外向,从而在屈辱与自强、困顿与自救、保守与激进、封闭与开放相交错的过程中走进了与西方进行全面接触的交往时代。中国的新闻业正是这一交往时代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一部中国新闻史正是中国进入交往时代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这样一来,中国新闻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就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该如何审视百年中国新闻业与新闻观念的演进?一种传统的做法是,在体例上以政治运动的分期来排列史实,自 20 世纪 40 年代章丹枫的《近百年来中国报纸之发展及其趋势》采用此法以来,学界似乎习惯

了这种做法。但仔细想来,这种做法既模糊了对新闻业内部结构及自身发展规律的整体观照,又限制了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新闻业历史命运的整体观照,从而使新闻史变成囿于民族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史或政治斗争史,使新闻观念的演进变成政治观念演进的一部分。用马克思“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观点来看,以政治运动的分期来排列史实,其实质在于,它忽略了新闻发展的现实基础——人的物质生产与交往的需要,试图遵照在新闻史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新闻史,幻想着政治斗争、阶级矛盾是新闻发展的动力,而且所描述的政治斗争、阶级矛盾囿于狭隘民族范围之内,因而,对中国新闻史的描述也仅具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地方性意义”,使人看不到中国新闻业与全球新闻业之间那种业已存在的联系^①。另一方面,单一的政治视角简化了存在于新闻发展史中的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从而缺少对新闻业内部结构及自身发展规律的整体观照。另一种传统的做法是,把中国新闻史当作纯粹的事业史对待,就新闻论新闻,极少放到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中考察,而是按时间顺序、史实的简单组合构筑着封闭的体系。显然,这种做法又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新闻是人类历史性的存在而非狭隘的事业性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再详细的史料收集与考证,再广泛的地方性、专业性史料的研究,也摆脱不了狭隘的体系和视角。看来,这两种做法都不适合于我们用来审视百年中国的新闻业发展与新闻观念的演进,但同时又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深入到新闻发展的现实基础——人的物质生产与交往的需要中去,从那里去寻找新闻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去发现新闻观念与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的广泛联系;深入到新闻业内部结构及自身发展规律中去,从那里去认清新闻观念演进的历程与方位。

通俗一点说,我们所要呈现的是,那些以新闻为业的人们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曾经做过什么,又曾经如何思考新闻的制作?他们为什么这样思考?其意义和价值何在?而这样呈现的目的无非是想弄清楚:中国的新闻业该怎样存在?以新闻为业的人们该怎样思考新闻的制作?显然,新闻业的发展离不开新闻观念的导引,而新闻观念的演进又是以新闻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新闻实践为背景的。因此,要得到真实的历

^① 单波:《“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中国新闻业的整体观照》,载《现代传播》1995年第4期。

史图景,就必须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这种思路下,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历史进程:从 20 世纪初到辛亥革命,新闻从业者把发源于 19 世纪中叶的新闻观念启蒙推向高潮,使新闻业走向现代化;从辛亥革命到 30 年代左右,人们全面、系统地思考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问题,走向以新闻为本位的时代;从 30 年代到 1949 年,新闻业走进大众化与新闻宣传并存的时代,人们对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问题的思考向纵深发展;从 1949 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新闻被纳入意识形态轨道的非市场化时代,新闻传播与组织传播合二为一,人们转向“以党报为本位”的新闻研究,偶尔在“新闻本位”层面的思考,也被笼罩在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之中,逐步单一化、简单化、经验化,直至只停留于“学习”、“领会”某种新闻宣传政策;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闻业步入信息化、市场化时代,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观念开始回归,对新闻规律的全方位、多视角、动态化的思考成为这一时代的主题。

也许,任何历史分期都有简化历史、图解历史之嫌。为了避免这样一种结果,我们还必须采用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去细腻地呈现 20 世纪新闻业发展和新闻观念演进的逻辑。

历史地看,正是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开启了中国人的现代办报观念,一扫传统邸报的陈腐气息,也正是那些或接受西方教育或与外国人较接近的中国文人揭开了中国近代新闻史新的一页。在 19 世纪 50 年代的中国,人们既不知报纸为何物,也不懂得什么是正确的报业观念,甚至以“搬弄是非”来轻薄主笔、访员。与西方传教士交往甚密并曾远游欧洲的王韬^① 开始不断引进西方的新闻观念,他屡次通过信函加以介绍,如“与周弢甫征君”书中云:“西国月报,备载近事,诚为译出,可以知泰西各邦国势之盛衰,民情之向背,习俗之善恶,其虚实了如指掌。”在《上丁中丞书》中又云:“西国政事,上行而下达,朝令而夕颁,几速如影响,而捷同桴鼓,所以然者,有日报为之传递也。国政军情,洪纤毕载,苟得而偏览之,其情自可了如指掌。”尽管用的是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的思考方法,但毫无疑问的是,近代意义的报业及报纸观念正是在中国文人向西看、把西方作为参照对象的过程中导入的。这种情况

^① 王韬与西方传教士麦都思、理雅各等人交友,其对报业的认识即受这些办报的传教士的影响。1867—1870 年,他赴英亲睹英国报业的盛况。

不仅仅发生在王韬一人身上,而且发生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一批有交往意识的文人身上。从《强学报》在1896年发表的《开设报馆议》一文中我们就能强烈地体会到这一点。该文在参照西方近代报业的发展后,以古代的采诗活动类比“新报之纪事”,提出“盖诗者,即今之新报”的观点,今天的人们很容易把这当作是“古已有之”的传统文化本位心态所呈现的荒谬之论,但同情地理解,这里面也包含着在参照西方的过程中更新传统的意味。虽然该文还未达到“参合诸家,兼收西法”的认识高度,但它所体现的比较意识,足以为西方报业和报纸观念的导入打开一条通道:

“今外国自明末开设报馆,自本国人民风俗,外国军政国事,及天文地理之新义,军械轮船之新样,一日新出,人人皆得而知之,用此风行,上自国主,下自兵丁妇女,无不乐观。今查外国报馆,美九百六十二,德五百六十,英一百六十九,法一百二十八,意大利一百零五,比利时、荷兰九十四,其余欧洲各国共二百五十,美洲小国亦一百五十。其报馆之大,如英之太晤士者,每日出七万张,故能下情无壅,邻敌互知,识见日广,人才日多,泰西富强盖以此也。我中国邸报开设千年,本远出西报之前,特未推而广之,采诗之法又未追而复之,上下内外,壅塞耳为(目),民隐莫达,人才日愚,又以此也。夫泰西能用吾采诗之法以致富强,吾不能推吾采诗之法、邸报之法而致愚弱,甚非计也。今公卿士大夫,政事所从出也,而远之不通外国之情,近之不通直省之事,故大之若运筹军国,既盲然而无睹;立约画界,自割地而不知;乃至达于章奏,见于清议,亦复谬陋。至于官吏作弊,奸欺四民,蒙冤受苦,耳目不接,如隔异国,有志之士虽欲留心,无所措其耳目,惟赖沪报及道路之传说而已,如坐管井,高议天地,以此为政,不亦难乎?至于士人自八股四书而外曾无所知,乃至以词馆之英以四川为近海,冒日本之接安南,澳门乃近星架坡,如此之流,不堪枚举。小民自乡井之外,颞颥无知,仅类牛马。以此当地球交通强邻四逼之世,安得不见侮乎。”^①

今天看来,这无疑是一篇从信息传通与社会发展的角度进行中西新闻比较的论文。虽然它并未对“上下内外,壅塞耳为(目),民隐莫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进行深刻揭示,而且还得出“泰西能用吾采诗

① 《强学报》1896年1月12日。文中的太晤士即泰晤士,星架坡即新加坡。

之法以致富强，吾不能推吾采诗之法、邸报之法而致愚弱”的错误结论，但它能从信息传递与社会发展的角度导入西方的报业观念，变通采诗之法和邸报之法的原始意义，确立报纸的地位，已具有非常重要的新闻启蒙意义了。该文随后提出办报有六利，即“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这种新的办报观虽有着“以智治愚”的单向传播思路，但它已把报纸引向社会政治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带，已赋予传播者面向大众、指导大众的社会角色，其进步意义已是无可否认了。该文刊出的同年，梁启超又在《时务报》创刊号上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明确提出“去塞求通”的办报理念，主张报刊应做到“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术要书”^①，试图以报纸激活国家政治文化血脉。翌年，吴恒炜发表《知新报缘起》一文，认为报纸是“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更为形象地表述了报纸在社会交往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在参照西方报业的发展之后，作者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国家发展与报业的关系：“故国愈强，其设报之数必愈溥，译报之事必愈详，传报之地必愈远，开报之人必愈众，治报之学必愈精，保报之力必愈大，掌报之权必愈尊，获报之益必愈溥。”^②在这里，作者把国家发展与报业网的建立、新闻传播内容与传播范围、新闻传播权及其保障、新闻传播效果以及报业研究——联系起来，俨然要把报业置于国家发展的中心。虽说这些维新派的办报人士在“救亡图存”的政治理念的笼罩之下，只想到上下内外之通与“国事”的关系，把报业与政治的联盟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实践，严重忽视了报业与人类精神交往的广泛联系，但由于他们已处于由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变的过程之中，即已处于破除传统的“天下”观念所形成的“华夷之辨”的思维模式、树立把中国纳入世界交往体系的“国家思想”的过程之中，因此，他们又在客观上把对报业的思考引向了人类精神交往的广阔时空之中，从而为20世纪中国新闻业的发展与新闻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思想之路。

与此同时，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潮流的冲击下，新闻业逐步进入中西文化互动过程的核心。历史地看，新闻传播业的兴起在西方是近代社会变化发展的产物，在中国则是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在经过

① 《时务报》1896年8月9日。

② 《知新报》1897年2月22日。

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它就由受制于传统文化的边缘状态移入引导中国文化转型与创新的核心地带,成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其兴盛与发达被看作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道理和指标。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确认“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①,以后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②的评价。其实,新闻传播媒介不仅直接推动社会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这不仅是新闻内容的功效,新闻业及新闻传播形式本身的发展演变,也起着重要的影响制约作用。在西学东渐的风潮中,中国的近代报刊无论分类、编辑、印刷、经营、发行,从形式到精神都全面模仿西方,打破了官报独占的格局,呈现出明显的民间化特点,如民办报刊的增多、民间印刷出版业的兴盛、民间发行网络的形成、新闻内容的社会化、读者对象的民众化^③。这样一种特点导致了整个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变,产生了多重的社会效应。显而易见的是,它改变了中国几千年人际间的经验化的文化传播形式,打破了封建正统文化和传统精英文化的垄断局面,促使都市通俗文化迅速浮升,不断刺激人们对于文化知识和信息的普遍需求,并以巨大的魔力使得知识群体摆脱对专制皇权的依附状态和向心运动,重新确立社会良心载体的地位,营造出民众广泛参与、思想流派纷呈的社会文化环境,以“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观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④的威力,发挥知情权和表达权,成为约束政治权力的社会制衡机制,同时也把中国文化引向了面向世界的发展道路。新闻媒介的这种文化表现已实实在在地说明了它本身既是中西文化传播的产物,又是中西文化传播的中介。虽然技术与工商业的优势曾使西方文化反客为主,战争曾简化了中西文化传播的手续,宗教也扮演过中西文化传播的重要角色,但真正完整呈现并参与中西文化的全面接触以及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涵化”过程,真正在社会文化领域取得决定性和关键性领导地位的,应该说还是新闻媒介。后来的历史证明,只要中西文化处于交流的过程之中(专制、封闭状况除外),包括新闻媒介在内的整个大众传播媒介就居于这

① 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丛报》第17期,1902年10月2日。

②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③ 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6—571页。

④ 《国民日报》,1903年8月7日。